

一九五六一至一九五七年北京的第二次工资改革实践^{*}

徐 鹏

[摘要]为解决第一次改革所遗留的问题,在提高职工工资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工资制度,1956年,中央党政部门启动第二次全国工资改革。然而,随着工人工资的增加与购买力的提高,多地均出现消费品短缺、物资供应紧张的现象。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物资的短缺与消费需求的刚性应对,生产领域并没有足够的弹性因应市场突然扩大的购买力。为平衡供求、保障工资改革成果与维护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国家通过调控工人工资过度增长、扩大商品供给等方式,逐渐缓和了因工资大幅增加所导致的物资供应紧张。第二次工资改革期间对工人工资的提高与调控,成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改善工人生活水平、平衡供求关系与维护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一次重要探索。

[关键词]工资制度;第二次工资改革;供求关系;计划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21)03-0077-10

合理的工资制度,对于调动工人生产积极性,保障工人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而工资水平的高低,则直接影响着工人购买力与生活水平的高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政部门对工资政策进行不断探索,并逐渐形成了“既不可不增,亦不可多增”,“在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使工资福利适当地逐步增加”的工人工资政策^①。与此同时,基于国家工业化目标的形成与计划经济体制对资源的约束,国家没有充足的资本以大幅度改善工人生活,以致工人的生活水平仍处在相对较低的状态^②。在1956至1957年的第二次全国工资改革中,党政部门对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从提高转向限制。工人工资政策从“提高”到“限制”的转折与张力,成为探讨新中国社会主义工资制度建立与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的良好切入点。

对于工人生活水平问题,宋学勤认为1956至1966年民众的物质生活质量整体上呈现出“两头稍高,中间较低”的波状发展态势^③。朱云河认为1956至1966年间北京产业工人的生活比1949年前有大幅度提高,且相较于全市居民处于较高水准^④。林超超并不否认1949年后工人生活的改善,但其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家庭生活水平进行实证性研究,认为受工资标准调整、供养人口增加、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上海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实现与工业生产的同步增长^⑤。20世纪50年代的两次工资改革均将提高工人工资水平作为主要工作之一。郑京辉以河北

* 本文是四川大学“从0到1”创新研究项目“新中国初期工人工资制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1949~1966)”(2020CXQ14)的阶段性成果。

①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建筑工程部工作的决定》(1953年9月7日),《中国建筑年鉴》编委会:《中国建筑年鉴》(1994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471页。

② 邓小平在1978年关于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谈话中即指出:“我们实行的是低工资政策,这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政策。……将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工资要逐步提高,各级工资数额要有所增加”。参见邓小平:《坚持按劳分配原则》,《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

③ 宋学勤:《制度与生活之间的张力:1956至1966年间人民物质生活状况述论》,《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4期。

④ 朱云河:《北京产业工人生活研究(1956-1966)》,北京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

⑤ 林超超:《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家庭生活水平的实证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5期。

省为例分别讨论了工资改革中各省之间工资数额的分配与改革后工资、实际购买力所出现的非对称性增长^①。既有研究或讨论工人的生活水平,或研究第二次工资改革中各方利益的博弈与改革后的影响,但对工资改革运行机制的研究则仍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本文以北京市的第二次工资改革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工资改革期间国家提高工人工资与平衡供求关系的实践,以求推动学术界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工资制度的建立以及20世纪50年代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关研究。

一、第二次工资改革的提出与北京工人工资的提高

自1951年第一次全国工资改革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至1955年,工资制度已出现部分问题,重点表现在工资增长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资分”制度保障工人生活的作用失效、工资奖励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等方面^②。如此,既有工资制度有了进一步优化的必要。与之同时,1955年7月,国家机关人员全部先行废止供给制和“工资分”,实行货币工资制^③,加之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与国家工业的初步发展,为再一次进行全国工资改革提供了可能。

1956年2月至4月,劳动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工资会议,讨论新一轮工资改革的内容、步骤与原则。会议期间,周恩来指出,“生产力发展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几年来职工工资增长却比较缓慢,部分职工的实际工资还有所下降。作为总理,我是有责任的”^④。而在工资制度上,“平均主义”倾向等问题突出,“非解决不可了”^⑤。由此,周恩来明确阐释了工资改革的必要性,并强调了工人工资“补涨”和调整工资制度的重要意义。李富春则报告了工资改革的意见,提出在工资改革中,要吸收工资工作诸多教训,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并且照顾地区间的差别^⑥。

针对既有工资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会议在“在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使工资福利适当地逐步增加”方针的基础上,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必须高于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国家才能有积累,同时又必须通过物质鼓励的作用,刺激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李富春强调,提高工资水平方面要避免“要么不增,要么多增”的波浪式增长,通过制定两年工资规划的方式,使增资工作更具长远性^⑦。关于第二次工资改革的具体安排,在增加工资方面,会议依照1955年原有职工1571万人计算,提出增加工资13.37亿元的控制数字,并确定分两年实现增长指标的计划,以免造成年度间工资增长过度不平衡的现象。其中1955年使用11.23亿元。对于工资制度,会议计划取消“工资分”,建立有伸缩性、统一的货币工资制度;在行业和地区间,进一步调整“产业顺序”和“地区关系”;在企业内部,进一步完善八级工资制,进一步对计件工资制

① 郑京辉:《1956年工资改革中国家、地方及部门利益博弈——以河北省工资改革实施方案制定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5期。郑京辉:《1956年工资改革后河北省职工生活水平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

② 《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1956年7月4日),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以下简称京档)110-001-00743。

③ 周恩来:《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1955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5年第16期,第779~780页。

④ 《周恩来为基本建设和劳动工资等21个专业会议代表所作的报告》(1956年3月4日),参见曹应旺:《周恩来自述评传》,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241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页。

⑥ 《李富春副总理在全国工资会议上的报告》(1956年4月3日),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SZ118-01-0114-026。

⑦ 《张友渔同志关于贯彻全国工资会议精神制定调整工资方案向市委的报告》(1956年4月10日),《北京档案史料》2014年第2期。

进行推广,调整奖励制度^①。此外,会议也指出,这次工资改革希望在大幅度增资的基础上,依据按劳付酬的原则,破除既有工资制度中的不合理、不统一方面,建立起较为合理、统一的工资制度^②。

全国工资会议后,各地区、部门又依据自身情况进行研究讨论与必要测算。由于部分省份与部门要求采用较高的工资标准,控制总数被提高至14.13亿元。五六月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召开全国工资改革方案平衡会议,再次对工资改革的具体方案进行综合平衡,确定增加工资14.08亿元,仍分两年完成,并计划1956年先用12.55亿元^③。新的工资标准计划自1956年4月1日起开始执行,全国共增加工资总额12.55亿元,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14.5%,人均增资80元左右^④。

通过讨论、研究与平衡,国务院形成了《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关于工资改革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与《关于工资改革方案实施程序的通知》^⑤等文件,并报经中共中央批准与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从1956年7月开始,覆盖全国国营企业、供销合作社企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前的公私合营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的第二次全国工资改革,正式启动。

随着第二次全国工资改革的启动,北京市也积极进行工资改革的相关工作。北京市第二次工资改革依然采取的是提高工人工资水平与改革工资制度的“两步并成一步走”策略,即一方面提高工人工资水平,对工资增幅进行“补涨”;另一方面,依据既定的改革逻辑,对工资制度进行调整。

关于北京市增加工资的工作,副市长张友渔7月16日在《关于工资改革问题的报告》中对相关问题做了解释,以统一工资改革工作的相关认知。张友渔强调,国务院规定的14.5%增幅和人均80元左右的增资额仅是统计意义上的平均数,在实际分配上仍需坚持按劳付酬,而不是平均地、或等比地增加工资。在国家层次上,国务院认可在坚持按劳付酬原则、国家工业化政策以及既有工资情况的基础上,对职工工资采取差异化增资的方式。此外,张友渔还指出,要求绝对的统一合理是脱离实际的。北京的部分企业存在工资水平一定要向上海看齐的思想,也是脱离实际的,需要进行纠正^⑥。在工资增长的结构方面,依据全国工资改革方案,“适当扩大高等级工人和低等级工人之间的工资标准差额,最低级工人的工资标准略予提高,高等级工人的工资标准通过扩大对低等级工资标准的等比差距,予以提高,使高等级工人的工资有较多的增加,以鼓励工人提高技术;实行计件工资标准,在同等级、同工种的计时工资标准上另加计件率,使计件工资标准高于计时工资标准”^⑦。北京市计划扩大高低等级工资之间的差额,采用高等级工人工资增幅大于低等级工人的形式。从标准上看,北京市国营、地方国营企业中,一到四级工人占全部工

① 《中央批转周恩来同志关于工资问题的报告》(1956年6月),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编印:《北京工作》第116期,内部资料,1956年7月20日,第2页。

② 《张友渔同志关于贯彻全国工资会议精神制定调整工资方案向市委的报告》(1956年4月10日),《北京档案史料》2014年第2期。

③ 《中央批转周恩来同志关于工资问题的报告》(1956年6月),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编印:《北京工作》第116期,第2页。

④ 《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1956年7月4日),京档110-001-00743。

⑤ 《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1956年7月4日),京档088-001-00245-00063;《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方案实施程序的通知》(1956年7月4日),京档088-001-00243-00028。

⑥ 《北京市调整工资办公室抄发张友渔副市长关于工资改革问题的报告的函》(1956年7月26日),京档089-001-00032-00098。

⑦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委员会:《杭州市工资改革方案》(1956年9月),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J101-002-046-082。

人的70%，除砖瓦业壮工增资较多外，其余月均增资两至三元，最低的仅增资几分、几角；但七级、八级工人则普遍增资较多，一般在10元左右。此外，低等级工人在这次工资改革中涉及面要比高等级工人大得多，以此实现推动低等级工人技术养成与扩大工资等级差额的制度意图^①。

根据北京市劳动局最终确定的方案，工业部门中工资标准最高的是石景山钢铁厂和京西煤矿的井下工人。石景山钢铁厂炼铁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为38元（原方案为35.5元，照顾到既有水平较高，故定为38元，高于鞍钢），最高113.6元（与鞍钢同），煤矿为35.5至113.6元（1956年为34.5至110.4元），机器制造业为34至107.5元，石景山发电厂为36至110.25元，国棉一、二厂为31.5至85元，北京造纸厂为30至85.5元。此外，在建筑企业中，全市实行统一的工资标准：33.66至94元^②。确定完工资标准提高的方案后，北京市对当月的工资按新的工资标准发放，并依据国务院的要求，对工人工资从4月1日起予以补发^③。具体到各企业，石景山发电厂至1956年12月，该厂职工的平均基本工资为70.91元，老工人79.13元，新工人59.54元。工资的增长可以从长期在此单位工作职工的工资水平的变化上反映出来。据1951年已在厂的455名老职工工资统计，1956年的基本工资比1951年调整工资前提高了78.5%^④。北京市印钞厂在这次工资改革中，直接推行以货币为计算单位的工资标准，在工人中进一步推行八级工资制（35至105元），并普遍增加了工资。该厂总人数为4068人，其中有4058人升级或增加工资，工资增幅为25%，人均增资12.19元^⑤。琉璃河水泥厂共有850名工人提高了工资，月工资总额从42900元增至49500元，平均工资从50.47元增加至58.24元，增幅为15.4%^⑥。

据1956年底北京市统计，在工资增长方面，北京市各部门（不包括中央级国家机关、新公私合营企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30万职工，共增资2700万元，年平均工资增加89.55元，增幅为13.96%。通过工资改革，约95%的职工增加了工资，5%的职工保留了原工资。其中，国营与地方国营企业有9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有75%至80%的职工每人每月增资3元以上；国家机关、文教卫生、商贸粮合等部门工资制度变动不大，一般工资增幅为10%，部分升级的职工增幅为20%；建筑企业平均增资13%，且由于实行计件工资，使得占工人总数90%的计件工人工资至少增加8%。总体来看，绝大多数职工都增加了工资^⑦。

二、物价上涨与工资改革“第二步”的暂停

随着全国工资改革的进行，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以及工资的补发，工人的购买力迅速扩大。7月20日，北京开始补发工资后，“领到了补发工资的人们，下班后纷纷拥向百货商店。北京的市场更加活跃起来了”。从20日开始，北京市百货公司的销售额开始上升，北京市百货公司所属七个门市部20日共卖出价值27万多元的商品，比19日增加了3万多元，“人们提着大包小包，欢

① 《北京市调整工资办公室抄发张友渔副市长关于工资改革问题的报告的函》（1956年7月26日），京档089-001-00032-00098。

② 北京市劳动局党组：《北京市工资改革情况的介绍》（1956年9月18日），京档110-001-00747。

③ 《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1956年7月4日），京档088-001-00245-00063。

④ 《市委批发市委工业部关于石景山发电厂的调查报告》（1957年9月12日），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57年），内部资料，1959年，第174页。

⑤ 《当代中国印钞造币志》编纂委员会编：《当代中国印钞造币志1948~2000》中册，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第582页。

⑥ 《琉璃河水泥厂工资改革后工资变动情况》（1956年10月30日），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档案室，档案号：工会档案1956-0118-0001。

⑦ 《关于这次工资改革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草稿）》（1956年12月22日），京档110-001-00747。

笑着从商店走出来”“补发工资以后，市场更加繁荣”^①。与北京类似，天津在1956年7月29日第一批工厂、学校、机关等单位补发工资后，大量民众也涌向和平路 and 滨江道上的各大商店^②，大量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因工人工资提高所导致的购买力扩大，可以从社会商品零售额中体现出来。北京市的社会商品零售额，1956年第一季度为2.988亿元，第四季度已增长至5.199亿元，增幅达74%。诸多民众生活的必需品尤其是副食品的供应紧张，除猪肉、麻油、奶粉、红糖等长期供应不足的商品外，蔬菜、鸡蛋、挂面、白糖、粮食制品、收音机等商品也出现了短缺的情况^③。

大量消费基金进入流通领域，市面物资短缺，加剧了物价的上涨。1956年下半年北京市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呈现出时间长、涨幅大、范围广的特点：从1956年上半年延续至1957年上半年；物价涨幅一般均在10%至20%，最低的上涨6%，最高的上涨30%以上；涨价范围包括吃穿及日用品等，除呢线、高级茶叶等少数高级消费品之外，绝大部分是食油、食盐、猪肉、蔬菜等民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对民众生活影响较大^④。

快速上涨的物价引起了民众广泛的紧张与忧虑。早在1956年上半年，由于物价已出现上涨的趋势，即有工人表示，“提高的工资还没有拿到手，物价就先涨上去了，何必提高工资呢？”^⑤而到1956年下半年，随着工资改革的进行，工人对物价上涨的不满日益积聚。有职工反映：“增加工资不多，物价要赶上来了”。有的职工问：“调整工资时说物价不涨，把工资分改为货币工资，为什么现在物价又涨了”。有的职工甚至议论说：“过去是先涨了物价，后涨工资，这次是先涨了工资，接着涨物价”，“去年增加了点工资，是不是政府后悔了，又把物价涨上去了”^⑥。

由于短时间内生产供给并无较大变化，对于上述商品供求失衡的原因，北京市委认为在于生产赶不上消费的增长。而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即是工资改革所导致的民众购买力的迅速扩大。但是，由于工资问题系全国性问题，北京市委短时间内无法改变，只得在其辖区内通过压缩机关消费、增强社会供应、组织货源、加强对自由市场的管理等形式，增加对社会消费品的供应^⑦。此外，北京市还成立物价管理委员会，统一负责全市物价的管理工作，以防止物价失控^⑧。

因增加工资所导致的供求失衡与物价上涨的问题在全国是普遍现象，很快被相关部门关注。1956年12月，陈云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七届十一次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总的来看1956年国营企业增加工资是正确的，但是有的地方增加得多了些。由于1956年增加工资，使得物资供应很紧张。新增的购买力进入流通领域后，造成了物资供应的极大压力。陈云认为，1956年工资工作的教训，是“工资放在一次加，物资供应不上，是不好的，还是分开加好一些。人民购买力

① 贺富明：《补发工资以后销货额迅速上升》，《北京日报》1956年7月22日，第1版。

② 新华社驻天津记者：《补发工资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工人日报》1956年7月31日，第2版。

③ 《市委关于目前商品供应紧张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7年4月26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编印：《北京工作》第149期，内部资料，1957年5月8日，第6~7页。

④ 《市委关于物价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5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编印：《北京工作》第151期，内部资料，1957年5月13日，第7页。

⑤ 《市委关于物价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56年7月21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1956年），第181页；《关于物价问题的报告（草案）及几年来有关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动简明表》（1956年3月15日至1957年7月2日），京档001-009-00385-00212。

⑥ 《市委关于物价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5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编印：《北京工作》第151期，第7页。

⑦ 《市委关于目前商品供应紧张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7年4月26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编印：《北京工作》第149期，第6~7页。

⑧ 《中共北京市委对市第一商业局党组关于当前市场物价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的批示》（1957年1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的提高,就必须估计到物资供应的可能,否则是空的。”^①通过陈云的讲话可以看出,中共要在保证物资供应和物价稳定的基础上提高工人工资。

面对全国物价的上涨,中共也认识到,因工资改革对工人工资的提高,导致工人购买力的扩大,并形成了市场上的供求紧张和物价上涨。但是,由于工资改革刚开始推行,尚未来得及对工资改革所造成的影响进行综合性评估,作为短期内的应急办法,中共中央决定通过叫停工资改革“第二步”以暂时应对。1956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是否贯彻原定1957年工资改革方案问题的通知》,决定暂缓工资改革的“第二步”增资工作,并停止升级与提高计件工资标准,相应的工资工作待1957年工资改革总结会议研究后再行确定。此外,国务院希望各地区、各部门对工资问题不要随便许愿,以免引起工作上的被动^②。

但是,这一时期各基层单位仍在积极推行工资改革,部分地方党政干部和职工无法理解中央暂停工资改革“第二步”的政策意图。为此,1957年1月,国务院工资改革工作办公室对“关于升级工作一律停止”给出解释。文件指出,由于1956年平均工资和工资总额的“翘尾巴”数额过大,1957年是否仍需进一步升级也还是问题,故而,全国的事业、企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的升级工作一律暂时停止,待全国工资改革总结会议对1957年工资增长指标的使用做出通盘安排和对升级的原则制度做出新的规定之后再安排下一步的工作^③。对于为何暂停1957年的增资和停止升级,国务院文件认为原因在于平均工资“翘尾巴”。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1956年工资的大幅增长,冲击了既有的脆弱的消费品供求平衡。正如1957年1月北京市委在关于工资改革的总结中所指出的:“自从1951年全面调整工资以来,除了有一部分工人升级以外,工人的工资没有增加,加上物价上涨和取消不合理的工资福利等,职工的实际工资是下降了,因此引起工人不满。由于过去几年没有增加工资,去年应该增加,以改变过去几年工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不相适应的情况;但是把几年应该增加的工资放在一年内增加,增加工资的幅度就显得大了。”^④

作为消费基金的一部分,工人工资的大幅提高,将会对国家的商品流转和货币流通产生极大的冲击。虽然国家在1956年计划投入的工资增资额是12.55亿元,但是,这并非1956年工资最终的增长额。据薄一波对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总结,1956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工资总额比上年增加了约27亿元^⑤,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全年职工的工资总额除以年平均人数)增长了接近14%。而1956年社会购买力达到约465亿元,比1955年增长了15.6%^⑥。可见,随着全国工资改革的进行,工人工资总额得到了大幅度提高,随即推动了社会购买力的扩大。

从1953至1955年工资标准均未提高,而在1956年的工资改革中,提高了工资标准,增加了

① 陈云:《购买力的提高必须与物资供应相适应》(1956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140页。

② 《北京市调整工资办公室关于对1957年是否贯彻执行原定工资改革方案有关问题的通知及林殿文的批示》(1956年12月13日),京档089-001-00032-00150;北京市调整工资办公室:《关于对1957年是否执行原定工资改革方案的通知》(1956年12月13日),京档132-001-00172-00095。

③ 《国务院工资改革工作办公室〈关于升级工作一律停止〉的解释》(1957年1月30日),冶金工业部劳动工资司编:《工资福利文件选编》第1册,冶金工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73页;北京市调整工资工作办公室:《抄转国务院工资改革办公室关于升级工作一律停止解释的电报》(1957年2月11日),京档132-001-00172-00097。

④ 《市委关于工资改革的情况和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57年1月14日),北京市工业口党史征编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有关工业方面的重要文件选编》(上),内部资料,1993年,第383~384页。

⑤ 国家计划的工资增长额为12.55亿元,实际工资总额增幅却是27亿元,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这12.55亿元仅是既有职工的增资额。除此之外,另有1956年新增加职工工资5.1亿元,以及新公私合营企业在工资改革后增加工资的数额。参见《中央批转周恩来同志关于工资问题的报告》(1956年6月),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委员会编印:《北京工作》第116期,第3页。

⑥ 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1957年7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1~382页。

计件工资,扩大了升级面,使得工资增幅出现“要么不增,要么大增”,“要么风平浪静,要么大风大浪”的做法。对于这种波浪式的增长方式,李富春在1956年全国工资会议上也认为其“不符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工资的原则,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不对的”。但是,鉴于1956年工资改革有“补涨”的性质,所以,1956年工资改革上的“大风大浪”似乎是躲不过的,李富春也只能要求,“以后制定工资改革方案要吸取这个教训,不能再搞‘波浪式’,以免造成被动”^①。

三、平衡供求与对工人工资增幅的调控

工人工资总额的大幅增长,其直接影响便是物价上涨与社会消费品的供求失衡。1957年,北京市的职工生活费总指数与零售物价总指数均达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高点,如以1950年为基期(即100),则1957年全社会职工生活费总指数为135.44,全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为134.29,均有大幅度的提高^②。

中央党政部门虽然通过暂停工资改革“第二步”以调控工人的购买力,但这一波物价上涨风潮在1957年仍在蔓延。在1956年的工资改革中,吉林省全省各产业、行业平均工资增加了17.26%,绝对额是8.55元。其中工业生产部门增长了16.27%,绝对额是8.85元。但是,据长春、吉林两市统计部门关于生活指数的材料,长春市1957年第一季度比1956年同期提高了7.64%,比1956年第四季度提高了6.81%;而吉林市1957年第一季度的物价也比1956年第四季度提高了4.4%。对此,吉林省总工会不得不承认,“工资改革以后,职工生活消费指数提高了,并且严重地影响着工资改革时增资幅度不大的老公私合营企业职工和基本建设工人,以及增资幅度低于平均工资增幅的一些工人……这些人在工资改革后生活提高并不大或者降低了原有生活水平”^③。

1956年以及1957年初物价的上涨与物资供应的紧张,并非仅仅源自于工人工资总额的大幅增加,也与1956年的时代背景有关。一方面,基于经济建设思路的“冒进”,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多用了15亿元左右。基本建设投资的扩大,使得原材料消耗增加,占用了一批社会消费品。另一方面,1956年三大改造进入尾声,国家对农产品、手工业品和轻工业品等民众日常所需要的社会消费品的统合能力迅速增强,并将其统一置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而社会消费品的计划性增强,也使得消费品领域应对需求压力的弹性降低。如此,工资总额的大幅度上涨使得社会消费品供求间脆弱的平衡被打破。这也就是为何1956至1957年北京市涨价的商品中,绝大部分是食油、食盐、猪肉、蔬菜等民众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原因^④。

对于1956年的供需失衡,国家尚可可通过暂停工资改革的后续工作加以调控,但是,随之而来的1957年失衡,却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由于经济运行的连贯性,诸多导致市场供求失衡的因素会延续到1957年,且部分原因还有放大的趋势,加之1957年新增加的因素,使得中共在1957年平衡供求关系的压力更为增大。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尤其是重工业主导的工业化模式

① 李富春:《工资改革的意义及改革的原则》(1956年4月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186~189页。

② 北京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北京市城市人民生活 and 物价史料1949-1988》,1989年,第141页。

③ 中共吉林省工会党组:《关于工资改革以后物价提高,职工生活指数上升的报告》(1957年4月30日),吉林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0017-1957-0001-0009。

④ 《市委关于物价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5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编印:《北京工作》第151期,第7页。

下,受资源约束的生产领域,其对消费领域的需求并没有足够的弹性空间。由于生产领域无法因应需求以扩大生产,平衡供求差距,导致市场上物资紧缺,物价上涨,故而,针对供给与需求的失衡,解决的办法无外乎两点,一方面是扩大供给,另一方面是压缩需求。

扩大供给方面,首先面临消费资料生产增加不足的问题。依计划,1957年生产资料增长8.1%,可供改善人民生活的工农业消费资料只增长5.2%,比五年平均低一些。加之要扣除人口增长而扩大消费的部分和一定的出口及储备因素,大体上用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部分增长为3%左右。其次是尽可能地扩大供给。虽然1957年通过压缩机关、部队等社会集团的购买力,减少出口与扩大进口,提高呢绒、高级纸烟等高级消费品的价格等,可以使市场供求关系基本保持平衡;但是,占商品供应总额70%的51种主要商品,估计供不应求的差额为7亿元,某些主要商品如棉布、食油、粮食、煤炭、纸张的供应仍会紧张。再次,是财政收支的压力。1957年财政收入预计仅能比1956年的288亿稍微多一点,然而,由于文教卫生费和工资“翘尾巴”所导致的支出增长,财政上仍将面临赤字。而财政赤字会导致供求的失衡与通货膨胀。此外,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也是生产与供应增长的核心问题。据庄启东^①估计,1957年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2.8%,铁道运输劳动生产率下降7.5%,建筑、安装行业劳动生产率能大体持平。劳动生产率的增幅缓慢使得平衡供求的压力进一步增大^②。

由于短时间内无法有效扩大供给,中共只得从消费角度着手,通过压缩或抑制购买力,以尽可能平衡供求关系。而压缩购买力的两个主要路径,一个是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规模,另一个是有计划地调控社会购买力的过度增长。

1956年12月,陈云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问题时的讲话中即建议要压缩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以缓解物资供求的紧张^③。1957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以总结1956年的经济工作。会上,陈云再次提出,要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使得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④。而对于平衡供求,调控购买力的另一个切入点,是控制工资的增长。1957年1月召开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为解决1956年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陈云提出要控制购买力,即1957至1958年内只能小量增加工资,升级加薪一般不动;除影响生产的、完全不合理的外,一般不能再提高农产品价格。陈云进一步提出,人民的购买力必须提高,但需适应消费物资的供给程度。会上,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也指出,1956年调工资是必要的,但调高了发生了问题,对升级、福利的标准管控不严,有些规定有毛病,制度不合理的应再研究^⑤。1957年1月中共中央的经济会议为1957年工资的调整确定了“只能小量增加工资”的基调。

但是,即便只是小幅度地增加工资,1957年国家仍面临较大的工资压力。1957年5月,庄启东在全国工资改革总结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1957年的工资,全国职工(不包括私营部分)工资总额预计将增加11.6亿元,增幅8.9%。预计全国各省市平均工资572.6元,增长4.7%。北京平

① 曾先后担任国家劳动工资局副局长、国家经委劳动工资局局长。

② 庄启东:《在全国工资改革总结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5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53-1957 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8-639页。

③ 陈云:《关于削减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投资的意见》(195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3卷,第141-143页。

④ 陈云:《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1957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陈云同志文稿选编 1956年-1962年》,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⑤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254、260页。

均工资676.4元,增长4.2%^①。虽然中共中央已决定不再大规模调整工资,但由于工资与人员的“翘尾巴”,1957年的工人工资总额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工资“翘尾巴”是指1956年提高工资标准和升级是从4月份和7月份开始的,而1957年则要发足12个月的工资,这部分预计要增加6亿元;人员“翘尾巴”是指1956年的新人员是逐月增加的,而1957年则要发足12个月的工资,这部分需要增加5.6亿元。这使得国家不得不应对因工资总额上涨所带来的物资供给压力。

出于平衡供求的需要,关于1957年的工资工作,庄启东提出该年提高工资的“第二步”不走了,一般不再升级,减发建筑、机械、纺织等部门生产任务不足、停工、窝工期间的工资,以压缩工资的增长幅度^②。在进一步计算和平衡的基础上,1957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1957年不提高工资标准的通知》。通知决定,尚未实行“第二步”工资增长工作的单位一律不再实行。对于因此而造成的工资上的某些不平衡现象,则在将来调整工资的时候逐步解决^③。

虽然国务院决定不再提高工资标准,但据1957年7月薄一波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1957年包括在国家计划以内的职工工资总额,计划为141.2亿元,比1955年增加12.1亿,增幅为9.4%。其中由于工资“翘尾巴”增加5.7亿元,人员“翘尾巴”增加6.4亿元,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长4.5%^④。如此巨大的工资增长已经是国家努力平衡的结果。而1957年用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物资供给增长为3%左右^⑤,这就意味着,中共竭力来调控工人购买力的增长,同时尽可能地扩大供给,最终也仅能将供求之间的差额压缩到1.5%的脆弱平衡上。

至1957年下半年,基于多种政策的推行,北京的物价渐趋平稳。北京市职工生活费总指数与零售物价总指数在1957年达到高峰后双双开始回落,1958年已回落到1953至1954年间的水平^⑥。北京市的第二次工资改革,在保持工资增长的基础上,逐渐控制了物价的上涨,保障了工人工资的购买力,维护了工资改革的成果。而在宏观层面上,国家所进行的调控工人工资增幅的工作也基本结束。但是,为平抑因增加工资所导致的物价上涨,劳动部门的主要力量仍集中在如何调控工人工资的过快增长,没有足够的力量对工资改革中所产生的制度性问题进行调整。正如劳动部在对1956年工资改革的总结中所指出的:“这次工资改革也有严重的缺点,就是工资增加过多了一些,工资制度的某些方面也没有改革好”^⑦。虽然经过1957年的调整,因工资增幅过大所导致的商品供求失衡问题逐渐得以解决,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1957年下半年,尤其在1958年,工人工资制度中的内部张力日趋绷紧,并进而导致了“大跃进”期间对既有工资制度的系统性否定。

① 庄启东:《在全国工资改革总结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5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53-1957 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637页。

② 庄启东:《在全国工资改革总结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5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53-1957 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637~638页。

③ 《国务院关于1957年不提高工资标准的通知》(1957年6月13日),《江西政报》1957年第11期,第18页。

④ 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六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1957年7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405页。

⑤ 庄启东:《在全国工资改革总结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5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53-1957 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638页。

⑥ 北京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北京市城市人民生活 and 物价史料1949-1988》,第141页。

⑦ 《劳动部关于1956年工资改革工作的基本总结》(1957年7月11日),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95-001-346-004。

结 语

1956年,为改善工人生活,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中共在全国进行了第二次工资改革。然而,由于合作化的进行与国家对农产品供销计划性的增强,以及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的进行所导致的大量原材料消耗,工资改革使得本已脆弱的消费品供求平衡被打破,消费品供应紧张,物价快速上涨。为平衡工人购买力提高与消费品短缺之间的关系,第二次工资改革后续的工人工资增长工作终止,中共在采用多种方式增加物资供给的同时,对工人工资的增幅进行调控。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资源的约束与短缺,生产领域无法有效回应因工资改革所导致的短时间内迅速扩大的购买力,大量的消费资金被积滞于流通领域中,市场物资供应紧缺,物价上涨,进而对整个国家的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造成系统性影响。工资问题从分配领域进入消费领域,进一步转入生产领域,导致整个经济领域各环节趋于紊乱。在国家宏观经济运行中,随着工业化的进行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家需要对宏观经济运行实行高度的计划,筹集尽可能多的积累基金推动国家的基本建设。作为消费基金的一部分,国家只得通过调控工人工资的过度增长,来保障国家工业化的资本投入,平衡因物资短缺所带来的消费品供求失衡。1956年第二次全国工资改革对工人工资的提高,即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资源型约束,以及国家工业化的重工业路径无法因应突然扩大的购买力,最终使得调控工资增幅成为平衡消费品供求关系与维护国民经济稳定运行的必由选择。

(本文作者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成都 610207)

[责任编辑:侯竹青]

《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要目

再谈国史分期问题	朱佳木
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认识与评析	高晓林 黄冰琼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优待劳动日研究	王 玲
三线建设中的土地征用问题研究 ——以四川816工程为例	秦 颖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有线广播站的初期建设 ——以江苏省为例(1955—1957年)	马 瑞
全民动员:南京市解放初期的卫生防疫	张慧卿
1949—1956年中国赴苏参观代表团研究	肖 钊 罗玉明
1949—1966年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在中国的出版与大众阅读	杨 林
公安部队领导体制的调整与变革(1953—1958年)	姬文波
海外视域下的中国贫困治理研究	付 正 刘纯一